

婦女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美國婦女史學界的反思

俞彥娟* 編輯校訂

張淑卿、陳瑩芝、吳燕秋、張斐怡** 摘譯

從 1999 年到 2004 年，美國的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推出兩個系列文章，“Women's History in the New Millennium”和“The Future of Women's History”，邀請不同世代、不同領域的學者針對發展已超過 30 年的婦女史研究領域做全盤檢討，並且展望未來。本專題特別摘譯其中四篇文章，提供參考。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首先，老中青三代學者就進入婦女史領域的個人故事、政治關懷以及對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展開對談（請見〈婦女史學者跨世代的對談〉，張淑卿摘譯）。其次，學者回顧婦女史研究經典著作的影響，並瞻望未來發展，例如對 Louise A. Tilly 和 Joan W. Scott 在 1978 年出版的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研究員

** 張淑卿，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陳瑩芝，私立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吳燕秋，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張斐怡，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Women, Work, and the Family (請見〈婦女史經典的回顧與反思(1)〉, 陳瑩芝摘譯), 以及對 Adrienne Rich 於 1980 年發表的“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請見〈婦女史經典的回顧與反思(2)〉, 吳燕秋摘譯) 的討論。最後, 對婦女史研究理論有重大影響的 Joan W. Scott 對「女性主義歷史」的發展以及婦女史研究的未來提出他的看法 (請見〈女性主義歷史的未來〉, 張斐怡摘譯)。

婦女史學者跨世代的對談¹

張淑卿 摘譯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的主編 Leila J. Rupp 在思考兩千年的婦女史研究方向時, 認為這是一個反省過去以及展望未來研究路線的好時機。對歷史學者而言, 要他們討論未發生的事件是相當困難的, 但 Leila J. Rupp 認為思考這個問題對於剛入門的年輕學者, 將有極大幫助。在助理編輯 Birgitte Søland 建議與聯絡下, 很快的組成了 Anne Scott/Sara Evans/Susan Cahn/Elizabeth Faue「家族」, 形成三個世代婦女史研究者的對談。這個對談的範圍極廣, 主要有三個面向, 一是進入婦女史研究的個人故事, 二是對談者的過去與現在的政治取向與關懷, 三是對婦女史研究理論與方法學的反省。為突顯不同世代間之差異, 本文將以個人為主軸, 摘要其所談之內容。

1 Anne F. Scott, Sara M. Evans, Susan K. Cahn, and Elizabeth Faue, “Women’s History in the New Millennium: A Conversation Across Three Generations,” Part I & II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1:1 (Spring 1999), pp. 9-30; 11:2 (Summer 1999), pp. 199-220.

第一世代：Anne Scott²

Anne Scott 於 1930 年代就讀大學，偶像是 Dorothy Thompson、Anne O'Hare 和 Eleanor Roosevelt，Scott 以為自己長大後會成為記者。她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在 Syracuse University，Scott 受女上司 Mary Gilmore Smith 院長的影響頗深。相對而言，Scott 的第二份工作在一個男性主導的國際貿易公司，而且是因為當時男性被徵召入伍，女性才有機會進來。在工作中或在西北大學唸研究所並沒有激發 Scott 的女性主義。研究所畢業後 Scott 先是成為國會議員助理，後來到婦女投票人聯合會 (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 LWV) 工作，與曾經參與婦女投票權運動的前輩共事，對 Scott 後來走入婦女史研究的影響很大。

Anne Scott 的家庭在 1929 年至二次大戰結束期間生活非常艱困。她的父親在南方農場長大，後來成為大學教授，但仍將自己定位為農夫。她的母親來自一個南方蓄奴莊園，但後來選擇成為小鎮的社會運動領導者。雖然家境不好，由於雙親相當重視教育，Scott 與其他兄弟姐妹均擁有研究所以上的學歷。

Anne Scott 於 1930 年代在南方上大學時，校內幾乎沒有任何「基進」課程，教師都非常保守，似乎希望學生停留在討論 19 世紀「南方的生活方式」。不過，Scott 參與了不同的宗教活動，而且開始對民權運動有想法，但是從沒想過女權的問題。不過 Scott 一直認為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她可以做得更好。政治上，Scott 對國際事務、新政計畫、羅斯福總統夫人等議題有興趣。

Scott 記得 1959 年她在北卡羅林納大學圖書館尋找與婦女有關之書籍，只找到書櫃中兩層的書，而且大多數是 19 世紀與 20 世紀初出版的。而現在 (1999 年) 相關研究多的不勝枚舉，還有各種工具書，例如 *Notable*

2 Anne Scott 是 Duke University 的教授，主要著作有 *The Southern Lady: From Pedestal to Politics, 1830-193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One-Half the People*, with Andrew M. Scott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75); *Making the Invisible Woman Visibl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4); *Natural Allies: Women's Associa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American Women。Scott 認為面對快速的改變，年輕學者對前輩學者的影響更大。對於婦女史研究的未來，Scott 憂慮婦女史家過度專業化，以及生產過多研究。

第二世代：Sara M. Evans³

Sara M. Evans 在此對談中屬於中間世代，1963-64 年間，就讀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 時成爲 Anne Scott 的學生。Scott 的教學以「積極學習」著名。Evan 在此堂課寫的報告是關於內戰時期一位年輕女性到監獄拜訪的日記，Evans 努力想了解爲何日記充滿的是該女子對愛情的追求，而不是監獄的恐怖。

Evans 來自南方的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牧師，經濟上不算寬裕。Evans 的祖母與外婆均接受過大學教育。Evans 在美國南方長大，社運經驗讓她對南方的種族、階級與貧窮白人的問題有濃厚興趣，特別是黑人社區的階級形式以及貧窮白人的複雜現狀。

Evans 深信婦女在歷史上應該有自己的位置，同時婦女也能創造歷史。Evans 於六〇年代唸杜克大學時，非常活躍。她加入民權運動 (civil rights movement) 和非洲服務隊，後來選擇國際關係與非洲史做爲主修科目。大學畢業後，1967-68 年間 Evans 參與芝加哥的婦女解放運動和達拉謨 (Durham) 的社區與勞工組織，同時將婦女解放運動帶入北卡羅林納州。因爲參加婦女運動，Evans 相信，一個告訴女性去創造歷史的婦女運動，應該有自己的歷史。於是在 1969 年 Evans 進入北卡羅林納大學研究所研究婦女史，研究第二波婦女運動。

Evans 就讀研究所時，婦女史研究尙未系統化，但是 Evans 每門課的報告都是以婦女爲主題。屬於中間世代的 Evans，雖然經常得到其他對婦

3 Sara M. Evans 爲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教授，她的著作有 *Personal Politics: The Roots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New Lef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Born for Liberty: A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女史研究有興趣師長的鼓勵，如 Peter Filene、Bill Chafe 和 Anne Scott 等人，但也常感到孤單，因為當時沒有婦女史課程，歷史系幾乎沒有女性老師。

相較於自己是受到婦女解放運動啓發，Evans 注意到現在（1990 年代）大部分年輕的女性主義者，通常是在課堂上第一次接觸女性主義。Evans 同意現代學生往往從大眾文化或課堂中得到女性主義啓發的現象，是一項重要轉變。另一個重要的轉變是近數十年來婦女史研究的成功。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思考未來。這包括思考婦女史研究的未來、理論與跨學科的角色、學術與公共政策之關連性以及婦女史專業的訓練等。另一個重要的現象是，目前擔任婦女史教職者多是在 1960 年代聘任，大部分即將退休，新一代婦女史研究者人數眾多，在大學裡通常只能擔任其他專史的教學，但也會把性別議題融入教材中。

Evans 和 Anne Scott 一樣受過傳統史學研究法訓練，她的理論則是來自與其他社運人士的討論。對於現在學術發展，Evans 觀察她的研究生，分別來自歷史與美國研究兩個學門，各有不同的研究取向。美國研究的研究生多從理論入手，在抽象層次發展問題與假設，再著手尋找一連串可供分析的資料。歷史研究生則重視「基礎」，對於特別的時間或地點感興趣，資料與分析都是非常具有「歷史」性。美國研究的研究生做歷史研究時，因為先看到文件的特殊性，被迫承認時間順序的重要性，才去說一個他們要說的故事。歷史研究生則先發現有不同版本的敘事，開始尋找理論工具來分析這些不同的敘事。Evans 不願去評價哪個研究取向較好。對於世代間的差異，Evans 認為是健康的。Evans 相信學術界與社會運動界是平行發展的，女性主義史家學者經常從社會運動之中找到研究議題，這議題來自對現在社會的批評。所以對 Evans 這一代婦女史家而言，他們從行動之中找尋研究課題，並將這些研究課題應用至歷史研究之中。

第三世代：Elizabeth Faue⁴與Susan Cahn⁵

(一) Elizabeth Faue

Elizabeth Faue 屬於第三世代。1974 年 Faue 進入明尼蘇達大學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專修俄文。大學時代的 Faue 寫詩、寫小說、閱讀政治家自傳與政治學理論，大三、大四時，選修有關女性主義文學的課程。Faue 原先對於自己大學之後人生會如何發展，是相當迷惑的，但希望找到目標使自己在這世界上的角色是積極的，變成「自己生命中的英雄」、以及發現「婦女、家族與社區的歷史」。1978 年秋天，在朋友的建議下，Faue 選修了 Sara Evans 的大學部課程。在 Evans 的社會學史研究和政治熱情中，Faue 找到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方向，於是在 1978 年底，申請進入婦女史研究所。

Faue 來自一個維多利亞式的工人階級傳統家庭。在她的成長過程中，並沒有任何勞工階級的女性主義者典範可以學習，只好不斷反抗家庭的約束。Faue 覺得自己與前輩學者不同處，是她先成為女性主義者，再去參與社會運動。大學時代，她已了解到女性主義將深深影響自己的求學、寫作、生活與政治取向。她也知道，欲了解文學，必須了解歷史。於是她同時進行文學創作以及歷史研究與教學。

開始研究婦女史的頭幾年，Faue 發現自己有點疲於奔命。倒不是因為以前未接觸社會主義或女性主義之理論，而是真實世界的眾聲喧嘩；新辭彙、新觀念、新經驗一起出現在有關性別、種族、階級、性平等的

4 Elizabeth Faue 為 Wayne State University 歷史系副教授，其代表著作有 *Community of Suffering and Struggle: Women, Men, and the Labor Movement in Minneapolis, 1915-194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以及 *Writing the Wrongs: Eva McDonald Valesh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merican Labor Refor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同時還有多篇討論性別、勞工與政治之學術論文。

5 Susan Cahn 為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歷史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 *Coming on Strong: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Women's Sport* (NY: Free Press, 199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冗長討論之中。女性主義在學術界的革命已經發酵，開拓新起點，不斷地討論種族、性政治和階級議題。Faue 相信婦女史課程的核心是讓女性從被動到主動，從歷史的客體到主體，從非政治到政治。因此女性主義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重建歷史中的「女性主體性」。

Faue 觀察到不同學術世代的發展不均衡，是因為不同地區的大學、研究單位和課程的發展速度不同。即使可能有獎學金、想法，甚至是老師，但制度上的安排，如機構、專業領域、學程、科系、師資和經費，卻相當缺乏。因此，要將婦女史融合至主流歷史研究是相當困難的。至於將婦女史書籍納入美國通史、資助婦女史研究獎學金、或將性別分析放入系所的學術活動，仍然零散的在各處進行著。例如在 Faue 唸書的大學，婦女史幾乎已是獨立學門，但是在 Faue 第一個任教的學校，婦女史卻是相當邊緣的。

當 Faue 在明尼蘇達大學唸書時，驚訝地發現系所成員與研究生對女性主義學術的態度，有的同情，有的敵視。Faue 進入研究所後，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例如反核運動、還我夜行權遊行等，但是對於校內的「父權體制」以及眾人沉默的態度，特別是研究生自我感覺良好的態度，感到憤怒。於是她的作業、報告都變成婦女史研究。Faue 撰寫博士論文時，閱讀大量女性主義理論與歷史研究，特別是歷史學者 Louise Tilly 與 Alice Kessler-Harris 對於性別與階級的作品。Faue 的研究中心議題是：在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運動中，女性如何發展？Faue 同時採用先前習得的社會史研究方法，以及對文本與圖像解釋的新興趣，來進行個案研究。從她開始博士論文寫作，婦女史的研究方法出現重大轉變。Faue 受到此影響很深，在她的博士論文和後來的作品，都可以看出她企圖理解性別化語言和男子氣概的理論與實踐，如何形塑男性與女性的政治與勞工運動。Joan Scott 有關性別和語言的研究，以及他提出用較寬廣的社會建構理論來討論性別、政治、種族、階級等議題的方法，對學界影響很大。而 Faue 是屬於第一批受到 Scott 影響，開始使用這些概念和方法來研究社會史的學者。用這種方式來研究，正是走向「性別研究」。

Faue 認為過去十年婦女史研究有三個重要主題，將繼續存在於現在

與未來婦女史領域：(1) 了解女性間差異的重要性，特別注意種族和認同政治的差異；(2) 性史研究的增加；(3) 重新注意婦女在公領域的表現。這些只是非常概括性的說法，但可以確定的是，婦女史和性別史已經從不同面向影響大多數領域，成為最熱門的議題。

Fauc 同時研究婦女史與勞工史，但她的研究生幾乎都是對勞工史有濃厚興趣的男生。Fauc 認為，婦女史學者的任務之一，是將婦女史研究介紹給其他歷史領域，並且帶出這些領域的性別分析。所以 Fauc 要求博士生在考試、學期報告或博士論文都必須處理「性別問題」。Fauc 深信婦女史研究者要同時鼓勵婦女史的發展，又要將婦女史與其他歷史研究領域相結合。

Fauc 同意此刻是重新評價婦女史領域、世代間對話與探究婦女史家的任務與未來方向性的重要時間點。她試著用一個假想故事說明婦女史研究現狀：有一群婦女史研究大師，用傳統史學方式，細心蒐集檢驗資料，採用完美方法，寫出有政治意義的歷史研究。他們用同樣標準來訓練自己的學生。另有一批歷史學者，訓練不是如此嚴謹，排斥女性主義目標或政治，但是採用「熱門」的理論，甚至模仿大師的研究外表，而非過程，並且大量生產。後者製造出水準不齊但大量的歷史充斥學界，其中有些的確借用或回應大師們的學術，有些則距離傳統學術太遠，價值不大。Fauc 認為這可以解釋為何婦女史研究過度生產，也可以解釋為何從現在看未來是非常困難的。她認為要思考婦女史的未來，必須先思考女性主義的未來。畢竟現今存在的婦女史研究，是受婦女運動（女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同性戀女性主義者運動）所啓發。另一個要考慮的面向是，當女性主義研究、性別研究、婦女史逐漸成長，美國教育界正經歷刪減經費、面臨政治與文化的挑戰，雖然婦女史與婦女研究在大學之中不再是邊緣學科，仍經常是系所的代罪羔羊或攻擊目標。

(二) Susan Cahn

Susan Cahn 與 Elizabeth Fauc 同屬第三世代。1975 年，Cahn 搬到柏克萊，表明自己的女同志身分，開始涉獵女性主義，閱讀大量的女同志

書籍與相關的婦女史研究。1976年 Cahn 進入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Santa Cruz) 就讀，同時主修歷史和婦女研究。大學畢業後，沒目標的工作一陣子，正好大學老師 Marge Frantz 邀請 Cahn 擔任她的婦女史課程教學助教。Frantz 是基進且具有啟發性的老師，啟發 Cahn 對婦女史的興趣。Cahn 的政治信念、對學術的熱愛，以及對先前工作的失望，促成她進入明尼蘇達大學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研究所並致力於婦女史研究。

對於個人政治關懷與經驗如何與其歷史研究互相呼應，Cahn 認為應注意「階級」問題。Cahn 以 Faue 為例，Faue 的成長過程雖缺乏勞工階級女性主義者的典範，她對勞工階級女性與勞工、社區的關懷與研究，與當時許多工人階級女性的奮鬥經驗是相呼應的。對於研究問題來源，Cahn 認為是來自婦女運動，但是又與每個人特殊經驗與進入該領域的時間點有關。例如 Anne Scott 在七〇年代前，對「看不見的女人」、「聽不見的聲音」有興趣，正是婦女史研究萌芽期。Sara M. Evans 要為婦女運動寫歷史，代表那一代的人正在創造歷史。Cahn 在七〇年代唸書時，參與過一些社會運動，但 Cahn 對性史與性政治有興趣，源自她自己的認同政治。Cahn 的大學教育與社運參與，促成她關心壓迫的結構問題以及各種「主義」。當她在 1980 年代進入研究所時，婦女史與女性主義研究已蓬勃發展，但大部分的問題意識還是依附在較大的政治範疇。Cahn 想從人類學與理論研究，嘗試理解壓迫女性的來源、資本主義與父權制度和性別之關係，以及公領域與私領域間思想與實踐之關係。

Cahn 對於婦女史的過去與未來，有幾個想法：第一，有關個人從何處得到啟發以及受到哪些研究與理論的影響。對於現階段婦女史學門往不同方向發展，例如更多的論文集、期刊、跨學科研究成果；更多美國以外的婦女史研究成果；開始有跨國比較研究；更多亞裔美國婦女史等，Cahn 認為這些狀況令人興奮但也令人憂心。憂心的是，許多學生研究問題靈感不是來自社運經驗，而是來自課堂、大眾文化或媒體。這或許是許多人走向論述研究，或後結構理論眾多原因之一。

雖然 Anne Scott 指出年輕學者影響年長的學者，Cahn 認為自己受

到同輩學者的文學理論與酷兒理論的影響更大。同時 Cahn 也受到婦女史前輩影響，不過 Cahn 通常會加入語言分析與文化研究。Cahn 對社會結構、社會解構與社會史有興趣，她的研究多是探討差異如何被生產，以及種族、階級、性別和性活動交互作用與形塑個人與社會的問題如何概念化。Cahn 的研究方法多少可以呈現出現今婦女史研究之取向。

第二，Cahn 認為婦女史研究的新方向至少有兩個：(一)、研究「婦女經驗」，包含女性主體性與身分認同。拜 Joan Scott 以及其他理論之賜，我們知道沒有不受影響的經驗，所以我們看語言如何創造「主體」，以及女性如何將社會經驗納入「主體性」。(二)、婦女史不只是美國史的另一章，而是已改變美國通史的內容。例如有關進步時期婦女對美國福利制度發展的影響，已經改變了美國史。

第三，有關婦女史的研究方法。如何寫歷史？到底怎樣算是採用傳統歷史研究法？這與理論取向較強的歷史研究要如何互動？對於有些學生只看學者和歷史人物如何再現某個歷史事件或歷史過程，而不問歷史上到底「發生什麼事」，Cahn 覺得驚訝，因為這與她的研究方法差異太大了。而學生也對於 Cahn 用史料來決定事件何時和如何發生的方法，感到驚訝。不過，Cahn 認為存在不同研究取向是一種「交換養分」，不是壞事。

結 語

最後，Cahn 將四人的對談，整理為下面七個問題。這些問題可用來檢驗婦女史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1. 婦女史如何改變或影響其他歷史學門的研究？
2. 我們從何處得到問題與靈感？我們期待完成什麼樣的工作？
3. 婦女史與女性主義運動或其他社會運動到底有沒有關連？如果有，這關連用什麼形式存在？如果沒有，我們希望看到或發展出什麼樣的關連？
4. 當我們檢視性別結構和基本知識分類（例如，婦女史中的婦女）

的建構本質時，這些看法如何改變我們做婦女史研究、教學和寫作？

5. 如何搭建學術與公眾史之間、婦女史與其他歷史領域之間、婦女史與女性主義政治之間、大學教授與學院外的歷史家之間、不同世代的婦女史研究者之間、以及實證與理論研究取向之間的橋樑？

6. 婦女史是從大學學術環境中發展而來。大學有長聘制度、學術自由和面對面的教學（相對於遠距教學），提供學者全職工作。當面臨學校經費刪減、法人化、學術自由和民主教育的反對者，我們如何能在此鬥爭中保有我們的價值，且進行有利於學術發展的改變？

7. 熟悉的史料、方法和理論將把我們帶往何方？新的和興起中的研究方向又可能把我們帶向何處？想像力將把我們帶向何處？

婦女史經典的回顧與反思(1)¹

陳瑩芝 摘譯

Louise A. Tilly和Joan W. Scott在1978年出版的*Women, Work, and Family*，是第一本全面探討從18世紀至二次世界大戰後，英、法兩國婦女在工作與家庭生活的著作，兩人的研究帶動了學術界研究婦女、工作與家庭關係的興趣。²二十年後，1999年*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的*Women, Work, and Family after Two Decades*專題討論，由四位學者：研究歐洲中古時期婦女工作的Barbara A. Hanawalt、研究近代美國女性勞工

1 Barbara A. Hanawalt, Thomas Dublin, E. Patricia Tsurumi, and Louise A. Tilly, "Women's History in the New Millennium: *Women, Work, and Family* after Two Decades,"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1: 3 (Autuman 1999), pp. 9-30.

2 Louise A. Tilly and Joan W. Scott, *Women, Work, and Famil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

的Thomas Dublin、研究近代日本女性勞工的E. Patricia Tsurumi，以及本書作者之一的Tilly，共同回顧這本1970年代的經典之作，一方面檢視這個主題二十年來的發展，另一方面分享這四位學者的研究經驗與對未來的展望。以下，我將這四位學者的討論分為：一、批評與質疑；二、研究經驗分享與建議；三、作者的回應。綜合摘要如下：

一、批評與質疑

Women, Work, and Family 是一本結合經濟學、人類學、人口統計學的綜合學科研究，Tilly 和 Scott 創新地運用戶籍資料、族譜，並參考劍橋學者的人口統計與家庭史的研究，呈現18世紀至二次世界大戰後，英、法兩國婦女的商品生產與提供服務歷史，比較不同國籍、地理環境、城市規模、經濟基礎與社會階級婦女的不同處境。作者以家庭與經濟的關係為基準，將這二百五十年的歷史分為近代家庭經濟、工業化與家庭薪資經濟、家庭消費經濟三大時期。在這樣的時間架構下，運用女性的生命週期 (life cycle) —— 少女、成年單身女性、已婚婦女、寡婦的分類，分析內容與組織討論，不僅用文字敘述，也用圖表表達不同處境女性的工作經驗。

不僅研究方法創新，Dublin提到他們對於工業革命影響婦女處境的觀點，也有別當時流行的Alice Clark和Edward Shorter的論點：Clark認為工業資本主義的出現，降低女人的社會和經濟地位；Shorter則認為工業革命帶給女人許多工作機會，大大解放了女性。³ 相較於Clark和Shorter認為工業革命帶給女人巨大改變的觀點，Tilly和Scott則是強調從工業化之前到工業化時期，近代歐洲婦女工作的延續性。

雖然 Tilly 和 Scott 大膽、創新的研究方法，使得這本書在1970年代

3 Alice Clark, *The Working Life of Wome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19); and Edward Shorter, "Female Emancipation, Birth Control, and Fertility in Europe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8 (June 1973), pp. 605-640.

晚期備受矚目，但是 Hanawalt 批評 *Women, Work, and Family* 即使增加了家庭和人口學資料，主要呈現的是婦女生活的全盤經驗（包括女人生產、單身、做為女僕和妻子），而不是婦女真實的工作情形。另外，Hanawalt 也批評本書的圖表，僅針對工業革命而已。

Dublin 則對書中內容有許多質疑，如他質疑 Tilly 和 Scott 提出由家庭經濟，到工業化與家庭薪資經濟，再到家庭消費經濟轉型的論點是否有足夠證據。另外，他質疑書中概念架構，是否能同時照顧到女性做為個人與做為家庭成員；以及本書的套用模式，是否需要考慮各國的國情等，加以剪裁並做更細緻的討論。

Tsurumi 雖然讚美 Tilly 和 Scott 成功地展示出，用工廠女工形象代表英、法兩國女性在工業化的經驗有失偏頗，而且隱藏女性勞工經驗的複雜性；但是 Tsurumi 也批評 Tilly 和 Scott 欠缺對女性勞動的詳細分類與描述。首先，女人付出的勞力有很多種：沒有報酬的勞力、生育勞動 (reproductive labor) 與家庭的消耗勞力，但是他們的研究卻只著重在有薪資所得的工作 (wage-earning work) 上；其次，生產勞力工作與生育勞動工作的區分並不合理，因為生育勞動也可能換取金錢，而且這樣的分類看不出家庭成員的勞力，會抹煞其他家庭成員對家庭經濟的貢獻。所以 Tsurumi 認為生育勞動工作應該被當作是生產勞力工作，不然會扭曲全體女性與個別女性的工作經驗。

二、研究經驗分享與建議

Hanawalt 根據目前中古史婦女與工作的研究主題發展，對 Tilly 和 Scott 的研究提出了許多建議。Hanawalt 藉由 Martha C. Howell 的 *Women, Production and Patriarchy in Late Medieval Cities* 與 Judith M. Bennett 的 *Ale, Beer and Brewsters in England* 這兩本書，描述男性在中古晚期取代女性在行會與製酒業地位的研究，建議 Tilly 和 Scott 觀察女人在家庭經濟的角色變遷時，不只根據內部的家庭結構，還要考慮外在的社會價值觀，因為

社會價值觀會影響政府、教會、行會等機構，壓制女人參與經濟活動。⁴

Hanawalt還認為研究女人在經濟上的課題，除了工作之外，還有財產(包括嫁妝、遺產)。Christiane Klapische-Zuber的*Women, Family, and Ritual in Renaissance Italy*，與Anthony Molho的*Marriage Alliance in Late Medieval Florence*顯示，中古時期女人已經不能掌管自己的嫁妝。⁵另外，Howell的*The Marriage Exchange*研究中古時期Douai與Flander的風俗，發現16世紀中葉的歐洲，妻子漸漸喪失與丈夫共同管理財產的權利。⁶所以從近幾年學者對於中古時期婦女財產的研究看來，Hanawalt認為女人的自由早在工業革命之前，已逐漸受到各種限制。他建議Tilly和Scott在評價女人對家庭經濟的貢獻時，也應該考慮共同財產、子女監護權、家庭決策權(decision making within family)等目前學術界關注的議題，以論定婦女在家庭經濟的地位。

Dublin則是運用自己研究19世紀美國新英格蘭(New England)白人女性勞工的著作*Women at Work*與*Transforming Women's Work*，⁷檢視同樣研究工業革命時期Tilly和Scott的*Women, Work, and Family*。Dublin的看法主要有三，分述如下：

(一) 對工作動機的質疑：Dublin從人口普查與稅收記錄發現，新英格蘭地區農村家庭並沒有因為家計而送女兒到工廠工作，這點與Tilly和

4 Martha C. Howell, *Women, Production and Patriarchy in Late Medieval C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and Judith M. Bennett, *Ale, Beer and Brewsters in England: Women's Work in a Changing World, 1300-16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5 Christiane Klapische-Zuber, with Lydia G. Cochrane trans., *Women, Family, and Ritual in Renaissance Ital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and Anthony Molho, *Marriage Alliance in Late Medieval Flor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6 Martha C. Howell, *The Marriage Exchange: Property, Social Place, and Gender in Cities of the Low Countries, 1300-15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7 Thomas Dublin, *Women at Work: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Community in Lowell, Massachusetts, 1826-18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and *Transforming Women's Work: New England Live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Scott 認為，少女爲了分擔家計而前往城鎮工廠工作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Dublin 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多數少女到工廠工作並非爲了家計，而是爲了追求物欲，或爲將來婚姻作準備，這才是少女到工廠工作的最大動機。

(二) 女工與父母同住的問題：Dublin 的 *Transforming Women's Work* 一書內容顯示，在美國波士頓 (Boston)、林恩 (Lynn) 等地新興的製鞋、製衣工廠，很多女工仍與父母同住，甚至與家庭成員共同經營工廠的外包工作，這與 Tilly 與 Scott 在書中描述很多工廠女工獨立在外、不與家人同住的觀察也有不同。

(三) 種族與移民的問題：1840 年代中期，美國新英格蘭地區湧入了大批的移民，移民和種族是 Dublin 研究美國女性勞工必須考慮的因素，不過 Tilly 與 Scott 在書中完全沒有考慮種族問題。Dublin 的研究顯示，很多歐洲女性勞工移民到美國所從事的工作，與她們在家鄉的工作有關，例如在羅威爾 (Lowell) 製鞋工廠的歐洲女性移民，以愛爾蘭人最多，這個例子顯示，在移民美國之前，她們可能從事類似的工作。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大量歐洲移民投入美國工廠工作之際，是 Tilly 和 Scott 界定的工業化與家庭薪資經濟時期，所以 Dublin 認爲 Tilly 和 Scott 研究這時期英、法兩國的女性勞工，也應該考慮種族與女性工作的關係。

Tsurumi 則是從近代日本女性勞工的研究，檢視 Tilly 和 Scott 的研究。他在 *Women, Work, and Family* 這本書看不到婦女的感覺、想法與意見。雖然書中引用許多婦女所說的話，但是看起來像是支持作者論述的證詞，而非顯示當時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 婦女內心真正的想法。到底英、法兩國的婦女對於家庭和工作的看法如何？Tilly 和 Scott 認爲在工業革命之前，婚姻是剔除單身女性成爲家計負擔的方式之一，但是這些單身女性真的認爲自己是需要家庭扶養的人？她們認同婚姻是一種減輕經濟負擔的方式嗎？Tsurumi 認爲需要聽聽這些婦女的聲音，唯有透過瞭解當時婦女的想想法，才能消除我們根深蒂固的偏見，避免妄下違背事實的謬論。

除了聽不見婦女的聲音之外，*Women, Work, and Family* 這本書還缺

乏對家庭情感關係的論述。情感關係是女性對家庭內外認同很重要的部分，而在認同中能找到解釋家庭權力分配問題的線索。Tsurumi 認為妻子或母親控制家庭的開支、食物的配額，有理由認為她們在家中是具有權力的，但是在社會文化下，女性往往犧牲自己的權力，所以文化限制女性施展可能有的權力。究竟女性在家中有何權力？這是 Tsurumi 希望從 Tilly 和 Scott 的研究中瞭解的。

Tsurumi 在文章最後，以日本人類學學者 Mariko Asano Tamanoi 的 *Under the Shadow of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Rural Japanese Women*，⁸ 勉勵有志於從事婦女、工作與家庭研究的學者，要像這本紀錄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日本鄉下小褸母（8-10 歲，照顧幼小姊妹的小女孩）的研究一樣，學習 Tamanoi 的精神，努力讓那些被隱藏的、弱小的女性勞工有發聲的機會。

三、作者的回應

Tilly 提到此書出版之後，他和 Scott 不斷地思考，如何擴充婦女在公私領域商品生產與服務的討論。1987 年，Tilly 在 *Women, Work, and Family* 的再版序中，再次檢視「婦女」、「工作」、「家庭」，這三個名詞之間的關係，並修正本書的研究方法與提出新的關注。他認為社會關係是被建構出來的，隨著時間、空間的改變而不同，所以這本書把焦點放在社會結構與語言，而非結構上的改變與社會關係。Tilly 指出本書要呈現的，是一般女性在結構改變（如工業化、都市化）過程中的狀態，儘可能不用「現代化」這個不清楚和難以捉摸的字彙，以避免過度簡化和錯誤解釋現代化對婦女的影響。

對於 Tsurumi 在文章中提出的質疑，Tilly 承認這本書對家庭情感部分著墨不多，也沒有討論政治議題（除了提到女人在對食物抗議與在罷

8 Mariko Asano Tamanoi, *Under the Shadow of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Rural Japanese Wome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工的角色之外)。Tilly 並不想討論公領域或是家庭中權力的不平等，而是要強調存在一種社會期望——丈夫、父親統治家庭生活，而妻子、小孩合作（服從）。Tilly 對家庭策略的討論，從企圖去概念化行為下手。行為是整體生活方式的產物，而生活中合作（服從）往往優先於個人考量與欲望，所以他將「策略」定義為將某種文化觀點，運用到實際生活需求。如此一來，我們可以把家庭看成是歷史的產物，家是人類關係的變項，而不是具有統一形式的不變實體。

對於 Dublin 批評他的歷史分期與名稱，Tilly 解釋當初他與 Scott 討論後，決定不用編年分類，而用代表每個時期經濟特徵與相對應家庭關係的結構性分類，目的是希望幫助讀者瞭解近代歷史的轉變。對於後來學者僵化地採用這樣啓發式的分期模式，Tilly 不能認同且感到錯愕。Tilly 也承認這樣的歷史分期名稱是有爭議的，因為經濟過程一直在改變，他希望顯示這樣的改變，才冒險貼上標籤。

Tilly 也提到另一個他們忽略的問題，就是沒有顯示出婦女群體的複雜性。雖然他們採用自傳、生活史等資料，但是大多時候某個女性故事只能揭示部分的論點。針對這個問題，Tilly 認為補救辦法可以是研究模式外的獨立個案，或是深入討論大結構改變的參與者，但是 Tilly 認為此項作法並不容易。

文章最後，Tilly 提到如果重寫這本書的話，他希望能用社會科學的概念重新檢視這本書的組織。對於本書受到學者的肯定，他則感到欣慰。

婦女史經典的回顧與反思(2)¹

吳燕秋 摘譯

Adrienne Rich與〈強迫異性戀和女同志的存在〉

Adrienne Rich 於 1980 年發表〈強迫異性戀和女同志的存在〉(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對女同志研究造成極大的影響。該文質疑女人成為異性戀的必然性，認為應將異性戀看成是控制、剝削女人的政治建制。文中提到在西方的傳統中，存在著各種強迫女性成為異性戀的謊言，不是說女人無可避免地被男人吸引，就是說女人因憎恨男人才投向女人。社會科學傳統也提出兩性之間的愛是正常的，女人需要男人作為社會及經濟上的保護者，將異性戀家庭當成社會的基本單位，沒有男人可依靠的女人則需面對強烈的譴責。Rich 提出女同志的歷史存在事實，不僅打破了傳統的異性戀中心說法，也是女性拒斥強迫異性戀生活方式的具體表現。

Rich回顧當時幾部重要的女性主義著作，指出他們忽略女同志存在的現實及相關史實，並且闡述女性主義者的女同志議題盲點。除了分析強迫異性戀之社會建構，她也以某些女性歷史人物作為例子，揭露女同志存在

1 Leila J. Rupp, "Women's History in the New Millennium: Adrienne Rich's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A Retrospective," Adrienne C. Rich,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1980), Joan Nestle, "Wars and Thinking," Judy Tzu-Chun Wu, "Asian American History and Racialized Compulsory Deviance," Mattie Udora Richardson, "No More Secrets, No More Lies: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lison Kafer, "Compulsory Bodies: Reflections on Heterosexuality and Able-bodiedness,"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5:3 (2003), pp. 9-89. Adrienne Rich, "Reflection on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6:1 (2004), pp. 8-11.

事實 (lesbian existence)、說明女同志的連續體 (lesbian continuum),² 以及社會如何運用強迫異性戀機制「矯正」女同志。Rich特別解釋，討論女同志議題時，不能只是將女同志看成男同性戀的女性版本，因為女同志缺乏男性擁有的經濟、文化特權，而且這樣說法將排除歷史中女同志政治存在的重要性。所以女性主義者不應只是將女同志視為一種性偏好，必須對強迫異性戀建制提出女性主義的批評。

20多年後，*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的主編 Leila J. Rupp表示「〈強迫異性戀和女同志的存在〉形塑了我們對女同志歷史及性慾 (sexuality) 史的了解，³ 這是我們做這個回顧的原因」。⁴ 因此，在2003年*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的新千禧年系列企劃下，編輯取得Rich的同意，重新刊登該文 (1982年刊印於*Blood, Bread, and Poetry*，包含序及跋的版本)，並邀請與其同時的女同志運動者Joan Nestle⁵、在大學時代受到Rich此文影響的Judy Tzu-Chun Wu⁶ 及Mattie Udora Richardson⁷，以及該文出版時才10歲的Alison Kafer⁸，提出不同的研究回顧及討論。

-
- 2 女同志存在 (lesbian existence) 指女同志的歷史存在事實，以及我們對此存在持續創造意義。所有女人都存在一種女同志連續體 (lesbian continuum) 的可能性，透過每個女性的生命與歷史，有一系列的女性認同經驗，不只是對其他女性的性慾望，還有女性間其他的關係，例如，共有的心靈生活，共同對抗暴君，付出或給予政治支持，以及抵抗婚姻等都是。Adrienne Cecile Rich,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1980),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5:3 (2003), p. 27.
 - 3 Sexuality涵義頗廣，但在中文中並沒有適當相符的用字。筆者原譯為「性」，但為避免與sex混淆，且顧及行文順暢及理解方便，又為求譯詞統一，因此全文暫以「性慾」代之。編者按：Gail Hershatter譯成「性態」、彭小妍譯成「性象」，請參見本刊頁200、307。
 - 4 Leila J. Rupp, "Women's History in the New Millennium: Adrienne Rich's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A Retrospective,"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5:3 (2003), p. 9.
 - 5 Joan Nestle於1960年代起，任教於皇后學院 (Queens College)，1995年退休。她也是1973年成立的女同志她史檔案館 (The Lesbian Hersoty Archives) 發起人之一。
 - 6 Judy Tzu-Chun Wu現為俄亥俄州立大學 (Ohio State University) 歷史系助理教授。
 - 7 Mattie Udora Richardson於2003年發表此文時，為柏克萊加州大學非裔移民研究室 (African Dispora Studies program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博士候選人。
 - 8 Alison Kafer現為西南大學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跨科際研究室女性主義研究

同時代女性主義者的婦女運動策略批判

首先，讓我們先看與 Rich 同時期的女性主義者，如何看待〈強迫異性戀和女同志的存在〉這篇震聾發聵的文章。早在 1980 年，Ann Snitow、Christine Stansell 以及 Sharon Thompson 這三位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就對 Rich 提出批評，認為該文歷史推論史料過於薄弱，而且假意識 (false consciousness) 一詞也可能造成反效果，並強調女同志連續體隱喻會引起更大的誤解。女同志連續體也會簡化許多議題，像是將女性情誼 (female friendship) 等同女同志關係 (lesbianism)，將異性戀等同於強暴。若是隨意延伸這個說法，可能會導出「女同志關係 → 與男人性交 (不插入) → 與男人性交 (插入) → 強暴」的連續性推論，最後的結論會演變成，所有的女人都會承認這是真理與選擇不插入，同時墮胎權的選擇也會被簡化成對強制性交及其後果的抗爭。

Joan Nestle 則認為〈強迫異性戀和女同志的存在〉是 1970 年到 1980 年期間的性戰爭 (the sex wars) 中，有關婦女性愉悅與性暴力激烈討論的重要文獻。Rich 在文中宣稱色情工業將女性描繪成缺乏情感文本的性慾望客體，是男性消費的性商品，但是 Nestle 並不同意這樣的立場。她相信必須把性幻想、性自主、性愉悅當成終結性暴力的承諾，因此在首次閱讀該文時，她對其中提到的知識結盟 (intellectual alliances)、反性 (anti-sex) 色彩、超歷史主義 (trans-historism)，及不加區分地將婦女與女同志放在一起而感到生氣。身為女同志，Nestle 認為 Rich 從原先的異性戀變成女同志，爲了想要擴充異性戀女性主義論述的理論及政治面，才提出女同志連續體，但這些並非 Nestle 所熟悉的女同志社群及生活。

Nestle 回顧這些年來與 Rich 的相識往來，兩人爲不同的性陣營發言而數度交鋒，說明〈強迫〉一文生產的時空背景，也呈現該文不只是單純的書面文字敘述，而是嚴酷抗爭中的產物。Nestle 看到新一代學生，其中有些是酷兒 (queer)，有些不是。但不管她們是否爲酷兒，都拒絕理

所當然地接受像「母親」、「男人」，或是「女人」這樣的範疇。重看〈強迫異性戀和女同志的存在〉，Nestle 仍然覺得 Rich 太過肯定所有的假設，太渴望引領毫不質疑的支持聲音，也太過窄化女人的性的可能性，並且太過於本質化每件事情。但不可諱言，這篇文章就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是 1970 年代後期的女同志女性主義者 Rich，爲了抗拒學院中女性主義者排除女同志議題所作的文章，提供新一代女學生對非異性戀的想像空間。

亞裔美國人歷史中的異性戀機制與女同志存在

曾受教於 Rich 的 Wu 解釋，亞裔美國人歷史毫無異議地接受異性戀規範 (norm) 的研究趨勢，與此領域批判種族干涉家庭結構的論述基礎有很大關係。爲了說明以往對亞裔祖先的歧視，學者強調美國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排除法案 (exclusion laws)，這些政策不只限制亞洲移民的總數，而且造成亞裔人口性別比例不平等，尤其是勞工階級。另外，反對異族通婚 (anti-miscegenation) 的法律限制，讓亞裔男性無法在美國組織核心家庭。在種族與經濟的雙重剝削下，早期亞洲移民組織異性戀家庭受阻，使得亞裔美國人歷史偏好頌揚「模範」(normative) 家庭。對亞裔婦女進入美國的討論，多半是爲了討論亞裔第二代移民的出生，兩種現象被用來解釋亞裔美國人從旅居者到定居者的轉變。因此，亞裔移民異常性行爲的歷史經驗是種族歧視的結果，而強化異性戀規範的價值則是它的副產品。

不過，近來的研究已經開始挑戰這樣的偏見。Nayan Shah 對舊金山中國城內種族與公共衛生的研究，指出在 20 世紀前半葉，當地的華裔美國人倡導模範家庭形象，目的在推動他們的民權訴求，但是卻邊緣化原來已存在社區中的種種親屬、社交和性關係。Shah 提出「酷兒家庭生活」(queer domesticity) 的概念，說明華裔美國人單身漢、娼妓及非華裔旅人中發展出來的「非模範」(non-normative) 人際相屬關係。⁹

9 Nayan Shah, *Contagious Divide: Epidemics and Race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Wu的研究是有關第一位美國華裔女醫師Margaret Chung (1889- 1959) 與其他種族女性的同志關係。¹⁰ 無視男性主導 (male-dominated) 社區中人口和社會壓力，Chung決定追求婚姻外的愛情關係。最近亞裔美國人歷史對跨國研究的興趣，使未來研究走向可能重新探討被留在亞洲的妻子，她們在性、情感與社交方面的經驗。也就是說，早期亞裔美國人中被動的「偏差」環境，不只可以用來當作種族受壓迫的指標，也是探究「非模範」性的機會。種族區隔 (racialization) 促使性與社交關係的越界。Wu與Shah都同意，東方人的異國情調，加上道德敗壞的標籤，一起放在種族隔離的社區內，激發跨越種族疆界的性體驗及性吸引力。

許多亞裔美國人性慾史研究，已經採納 Rich 的女同志存在和女同志連續體概念，但相同的用詞還沒有被引用。「女同志」(lesbian) 一詞大多用在文學研究或是檢視當代女同志經驗，特別是有明確女同志身分認同的個人。其他亞裔美國人性慾研究採用其他的用詞，像是用酷兒或是同性戀 (homoerotic) 來描述這些挑戰社會規範的行為、慾望、性身分認同。Wu 認為這些用語的選擇反映出兩個趨勢。首先，「酷兒」是衍生自近來對同性戀與異性戀二分法的批判。其次，這些與女同志存在或女同志連續體不同的用法，試圖從歷史上脈絡化那些不需要整齊齊落入特定性範疇的行為與身分認同。但是，這些酷兒之類的用法，雖然指出各種反異性戀規範行為、信念和價值，卻不能清楚地指出女同志，也不能呈現其中「女人認同」(women-identified)。

非裔美國人歷史中的異性戀機制與女同志存在

Richardson 指出 1980 年與 2003 年的政治文化是非常不同的，因此當初 Rich 所依據的推論觀點，在今日看來是極不可靠的，例如對多樣性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10 有關Dr. Margaret Chung，詳見Judy Tzu-Chun Wu, *Doctor Mom Chung of the Fair-Haired Bastards: The Life of a Wartime Celebr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別和性慾未加區隔、無所不在的男性壓迫者，以及普遍存在的女同志姊妹情誼及女同志經驗。即使如此，這些缺點不能掩蓋該文的重大啟發性，促使 Richardson 開始質疑異性戀主義如何深植於結構之中，並成爲一個不一樣的讀者與思考者。Rich 的說法引領 Richardson 注意到過去女性主義學者對女同志的忽視，意識到她偏愛的作品中普遍存在的誤解，轉而思索非裔美國人歷史。

將黑人描述爲高尚有道德的歷史能動者的傳統，確立了異性戀的論述主軸，但也消除大量非異性戀黑人性慾與性別分類。在不斷否定非異性戀可能性的過程中，卻事實上重述它們的存在。Hazel Carby的《重建婦德》(*Reconstructing Womanhood*) 提到，19世紀的黑人婦女爲了讓「女人」的定義較能反映出她們的生活現實，採納了主流的婦德意識形態，然後適應，甚至加以轉化。她們要表現出「高貴的」、「體面的」的樣子，展現出完全的性純潔跟純異性戀的一面。¹¹ 歷史研究已經告訴我們，19、20世紀之交的黑人婦女社團運動，是由中上階級黑人女性組成的，社團提供政治組織及社區服務，來提升黑人婦女受教育及就業機會，但她們最優先考慮的是黑人婦女的道德名聲。

研究早期黑人婦女作家及知識分子的學者，也採取自我防衛的態度，諱言黑人婦女的性。但是黑人婦女並非完全不談她們的性，只是大多侷限在婚姻中的性關係。史家Darlene Clark Hine的研究〈強暴和中西部黑人婦女的內在生活：虛飾文化初探〉(“Rape and the Inner Lives of Black Women in the Middle West: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Culture of Dissemblance”)，說明對私人生活討論的嚴格規範，成爲黑人女性對抗壓倒性的性墮落論述的政治和個人保護工具。這種虛飾文化的策略思維，一方面讓黑人婦女創造出坦誠表達的外表，另一方面則是極力對壓迫者掩飾她們真實的內在生活及自我。Hine表示這個自我保護的策略造成人們對史料的不信任，因而更難找到討論黑人婦女性生活的一手史料。¹² 不過，

11 Hazel Carby, *Reconstructing Womanhood: The Emergence of the Afro-American Woman Noveli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 Darlene Clark Hine, “Rape and the Inner Lives of Black Women in the Middle West:

她的虛飾文化說有助於了解黑人歷史中，省略掉的黑人女同志及跨性別族群，特別是Rich文章中提到的強迫異性戀導致的扭曲現象。再者，Hine筆下黑人婦女的率真外表，有時只是維持異性戀性體面的面紗，其下隱藏著她們慾望經驗的事實。

強迫異性戀的政治及策略，深深影響 20 世紀的黑人歷史作品。許多史家忽略了這些身分認同違反模範性別與性慾規範的主體，錯失評估黑人婦女生活經驗複雜性的許多機會。Evelyn Hammonds提及對社區外公開黑人酷兒性慾及多樣性別時，會讓社區裡的異性戀成員感到內部的「不正常」現象被揭露，使每個人都面臨被攻擊的危險。同樣地情況也適用黑人婦女——「黑人女性性慾的特定表述，已經危害黑人個體及群體。」¹³ 對集體聲譽的關注，主導了非裔美國人歷史敘述，因此對黑人婦女社團運動的描述，成為非裔美國人歷史中呈現婦女特質的既定方式。但是Gloria T. Hull運用Alice Dunbar Nelson的日記完成《給我們每一天》(*Give Us Each Day*)一書，則呈現更細緻複雜的人際關係。¹⁴ 該書提到婦女社團提供婦女彼此碰面的機會，形成強韌的友誼關係、親密的勞動關係、浪漫的愛情，甚至是忌妒的不合。Hull還觀察到，Nelson的社交圈就是一個「活躍的女同志網絡」，許多往來的婦女還是有夫有子的。雖然《給我們每一天》提出不同以往的分析，但從 1984 年出版至今，還沒有人拿Nelson的日記來重新思考黑人婦女社團的政治工作及影響。

非裔美國人歷史不能將性別看成是可變動的範疇，再次錯失重新詮釋黑人婦女生活的機會。一些重要的黑人婦女故事經常現身在缺乏性別架構的黑人歷史中，像是女性 Cathy Williams 易名 William Cathy，在 1868-1870 年以男性的身分在水牛城服役的事蹟。很可惜學者並未從 19 世紀性別變動的研究著手，將 Cathy Williams 的她／他身分行為脈絡化，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the Culture of Dissemblance,” *Sign* 14:4 (1989), pp. 912-20.

13 Evelyn Hammonds, “Toward a Genealogy of Black Female Sexuality,” in M. Jacqui Alexander and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eds., *Feminist Genealog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181.

14 Gloria T. Hull, *Give Us Each Day: The Diary of Alice Dunbar Nelson*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 1984).

進而檢視種族化的性別意義。

Brenda Stevenson在她 1996 年出版的書中探討女黑奴嫁到外地 (abroad marriage) 所考慮的問題。從實際面及心理面的角度來看，女奴可能把嫁到外地當成是自我防衛的手段，例如藉此可以與可能被賣或受虐的親人朋友保持情感上的距離。但也有女黑奴希望藉此把社交關係延伸到居住的社區之外，不受小孩的父親干涉地管教小孩，掌握自己的性選擇，以及避開男人無法保護婦女被強暴或攻擊的痛苦現實。¹⁵ 但是，Stevenson並沒有討論是否有一些女性可能因此不受男人干涉，而與其他女人維持關係的可能性。進一步去想，嫁到外地有沒有可能是形成多樣關係的機會？像是以女性為主體的社區，或是在一些限制下，基於生育的目的有男性伴侶。這些可能性都在「虛飾」成爲歷史方法論後，喪失豐富歷史文本的機會。Richardson認爲Rich對強迫異性戀機制的論述，有助於從理論及方法論上，去了解非裔美國人歷史中設計出「虛飾文化」的祖先，這些虛飾文化阻礙了雙性戀、女同志，以及另類性別主體的出現。對非裔美國人歷史研究趨勢的簡短回顧，將有助於釐清從過去至今日的虛飾論述網絡。

黑人歷史之父Carter G. Woodson於 1915 年在芝加哥組成「黑人生活與歷史研究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egro Life and History)，與W. E. B. DuBois攜手寫書，駁斥社會大眾將黑人看成天生罪犯階級的謬觀，列舉傑出的黑人男性及具有代表性的黑人婦女，證明美國黑人的優秀之處。可是這些努力難敵當時美國白人史家大量生產關於黑人歷史著作，高談黑人的種族劣根性，合理化南方奴隸主對待黑奴的家長作風。Stanley Elkins在 1959 年出版《奴隸制：美國制度與智識生活的問題》(*Slavery: A Proble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中，提出奴隸制是將黑人男性當成小孩看待的封閉系統，男黑奴有溫馴、不負責任、卑微和懶惰等個人特質。¹⁶ 借用佛洛伊德的伊底帕斯情結說

15 Brenda Stevenson, *Life in Black and White: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the Slave Sou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 Stanley Elkins, *Slavery: A Proble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法，Elkins推論奴隸制中的家庭處於「怪誕的父家長制」(grotesque patriarchy)中，否定男黑奴的家長權威，主人成爲所有黑奴(成人與小孩)的父親，而黑奴女性仍保有母親功能。因此黑人男性在核心家庭中無法認同父親、模仿父親。結果，黑人男性只能是永恆的男孩，無法達到成熟的性發展——即「正常」的異性戀，讓母親必須在男主人缺席的情況下以父親的姿態現身。從這種黑人男性被去勢，而女性黑人變得男性化的說法中，可看到酷兒現象。

造成當代歷史長期忽略跨越性別規範黑人女性的原因之一是，20世紀對黑人母權家庭的建構。從1939年E. Franklin Frazier對非裔美國人家庭史的研究《美國的黑人家庭》(*The Negro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¹⁷顯示奴隸制度造成非裔美國人家庭長期欠缺有力的男性影響，卻有不恰當的強壯女性形象，導致黑人家庭隨著奴隸莊園中不受約束的母親角色(motherhood)走向自我毀滅。1964年，Thomas Pettigrew的《美國黑人的側寫》(*A Profile of the Negro American*)¹⁸整合Elkins及Frazier的論點，主張奴隸制度創造的女家長黑人家庭，造成黑人男女性別認同的危機，因爲這些女家長製造不恰當的性別組成。他舉例證明沒有父親的女兒預備承擔母親與父親雙重責任，比白人女孩對陽剛活動有興趣，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沒有父親的黑人男孩身上，導致他們更不成熟、更加依賴及陰柔。

1965年Daniel Patrick Moynihan發表了惡名昭彰的〈黑人家庭：國情報告〉(*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指出黑人女性的宰制嚴重阻礙黑人種族的進步。¹⁹許多史家明確指出，由Moynihan報告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17 E. Franklin Frazier, *The Negro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9).

18 Thomas Pettigrew, *A Profile of the Negro American* (Princeton, N.Y.: D. Van Nostrand Co., Inc., 1964).

19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in Lee Rainwater and William Yancey eds., *The Moynihan Report and the Politics of Controvers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7).

引發的爭議，催化他們從事這個研究。所以 1970 年代末期到 1980 年代的史家，強調奴隸婚姻和父親角色的重要性，並且指出男女奴隸之間曾經存在模範父家長關係。例如，Eugene Genovese 的研究宣稱奴隸對某些工作的性別分工，鞏固男人的養家身分，女奴隸對此並未表現任何不滿，而是強調家庭中的權威與性別分工，並且支持男性的要求。²⁰ Earl Thrope 說的好，種族成就必須靠輝煌的過去，但只要殘廢的黑人男性氣概沒有復原，則無法喚回光榮的過去。黑人男性氣概的危機被有耐心的、忠誠的妻子及善良且自我犧牲的母親所轉移。

受到 Rich 的影響，Richardson 企圖從歷史的縫隙找出黑人酷兒主體性，不斷地思考另類敘述及非傳統的解釋。她提出一個樂觀的說法，認為若是能充分地將黑人酷兒主體帶入研究，將會有完全不同的黑人婦女史。這樣的歷史不能只用異性戀關係和血親為組織原則，來解釋黑人移民、社區的建立及家庭形成等主要趨勢，而是要把慾望當成能被黑人歷史解釋的組織原則。對黑人女性主體的研究，不能單單只看她的生理性別以及她與男性的關係，而是必須把從種族主體產生的性別與慾望範疇也列入分析考量。

失能 (Disability) 女同志與強迫的異性戀機制²¹

身為失能的酷兒女性主義者，Kafer 在閱讀〈強迫異性戀和女同志的存在〉時，所想的不是異性戀政治機制，而是身體健全者的政治建制。她甚至不敢想像會有女性主義研究期刊出一專號，要求非失能的 (non-disabled) 女性主義者討論她們健全的身體狀態，對女性主義政治學

20 Eugene 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New York: Pantheon, 1972).

21 依照 Kafer 文章的脈絡，Disability 是健全身體 (Able-Bodiedness) 的相對用法，並非專指肢體殘障，還包括因外表特異、肢體障礙或罹患疾病所造成的不利處境。此外，Disability 也有失去能力的意涵，不管該狀態是生理因素還是社會歧視造成的。基於上述解釋及摘要行文流暢的考量，在此將其簡譯為「失能」。

的貢獻。借用並修改Rich的話，「用未經檢驗的〔健全身體〕中心觀點閱讀、書寫，或是教學對女性主義者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²²，但要這些非失能的女性主義理論家探討失能是非常困難的。她們的興趣只放在她們所認同的身分，以及探討這個身分認同對她們研究的影響。

談到具有相同特質的群體時，就像「女人」這個標籤，人們無法把「失能」當成是不證自明的分類範疇。Kafer認為，在說到失能時，「我們」是特別不穩定的用語，難以明確界定誰能被包含這個範疇內，誰又被排除在分類外。例如，肢體健全，但因大片胎記或其他可見的差異而受到差別待遇的人，能否被當成失能者？如果判斷失能者是困難的，要決定誰是「非失能的」或「健全的」也可能一樣困難。

Robert McRuer主張，當身體健全與其他問題放在一起討論時，必須先審視身體健全的意義。身體健全、失能的意義，如何能同時創造此強迫體系，又從此體系中衍生？McRuer在〈強迫的身體健全和酷兒／失能存在〉(Compulsory Able-Bodiedness and Queer/Disabled Existence) (2002)，分析強迫異性戀與強迫健全身體合作的方式，如何藉由酷兒、失能狀態來支持兩個體系運作。²³ McRuer師法Rich〈強迫異性戀和女同志的存在〉命題，用健全身體取代異性戀，用酷兒／失能取代女同志。這樣的用詞替代方式能夠運作，主要因為大家仍將失能看成是醫學或自然現象，而不是社會或政治現象。抽離了政治權力運作的思維，健全身體被當成是普遍的理想及正常生活方式，就像 1970-1980 年代看待異性戀的情形，顯示「女性主義對『強迫的健全身體』批判已經延誤太久了」。²⁴ Kafer希望能說服健全的女性主義者去檢驗她們健全身體的經驗，去批判她們

22 Alison Kafer, "Compulsory Bodies: Reflections on Heterosexuality and Able-Bodiedness,"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5:3 (2003), p. 77.

23 Robert McRuer, "Compulsory Able-Bodiedness and Queer/Disabled Existence," in Shaeon L. Snyder, Brenda Jo Brueggemann, and Rosemarie Garland-Thomson eds., *Disability Studies: Enabling the Humanities*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2002).

24 Alison Kafer, "Compulsory Bodies: Reflections on Heterosexuality and Able-Bodiedness", p. 79.

所處的機制、去挑戰婦女自由的意涵與模範，更開放地接受從女性主義失能觀點出發的策略，也能拒絕只為身體健全者設想的特權。

強迫的身體健全機制以兩種方式進行：利用身體力量和意識控制。身體力量指的是，對失能者施以肢體暴力，或是孕婦透過產檢掃描，發現胎兒某種「缺陷」後選擇墮胎的想法。意識控制是透過言語或非言語的方式傳達身體健全文化論。除非一個人自認失能，或是有明顯的肢體殘障，否則他就不算是失能者。但這種文化假設，使得社會將失能者孤立，而忽略有許多不同的失能狀態，因此健全的身體外觀往往阻礙不外顯失能者取得必要的服務。在強迫身體健全的社會中，總是質疑失能者，為什麼不去尋求改善／醫療以成為身體健全者。有時候，身體健全文化論甚至更衍伸出這樣的信念，如果透過治療也無法身體健全，這些失能者必然渴望自殺。對失能者不斷重複治療或自殺的對話，正顯示出身體健全的強迫性。

失能者基於失能狀態遭到歧視與壓迫，希望能透過其他方面訴說她們是「正常的」、「自然的」，例如特別支持異性戀關係。強迫異性戀機制將酷兒行爲及慾望看成不正常、不自然，而且不健康的，結果讓一些失能社群想遠離酷兒，特別是這些外形可見的失能社群內部，存在更嚴重的同志歧視及恐同症 (homophobia)。與家人同住的失能成人或孩童，避免在恐同的親人面前表現同性慾望，因為這通常會被親人解讀為孩子身體損傷的徵候，或是宣稱她們的孩子是無性的。Laura Hershey 也提到一些失能酷兒不敢出櫃 (come out)，是因為害怕她們的看護將因而辭職，而必須重新開始訓練新看護。

Rich 提到所有婦女都受到與強迫異性戀相似或相同的影響，但事實證明，強迫異性戀對不同社群的婦女，產生相當不同的效果，例如對失能婦女的影響就遠比 Rich 分析的複雜。失能者表達非異性戀的情慾，必須面對強迫身體健全與異性戀機制交互作用的雙重歧視。人們認為失能婦女沒有辦法找到男性伴侶，才把女同志關係當成最後的手段，她們的同性慾望被當成是失能造成困惑的暗示，甚至設想她們是沒有性慾的，認定她們的同性關係是柏拉圖式的愛戀。

Kafer 自問失能酷兒如何反抗強迫身體健全及異性戀？失能酷兒自身生活、身體與慾望的故事將以何種樣貌呈現？受到 Rich 將分析強迫異性戀及講述女同志生活史，當成抗爭的政治行動的激勵，她也把分析強迫身體健全及講述失能酷兒史，當成抗爭的政治行動。過去並非完全沒有失能酷兒史，相反的，存在大量講述性慾及失能的作品，包括 19 世紀末以來的怪胎秀，到 21 世紀的網站與八卦小報，都用聳動的方式報導失能者的性慾，以便支撐著異性戀和身體健全體系。最近已有些失能者，特別是失能酷兒，著述失能者的性慾及性經驗，並且探討酷兒認同與失能者認同的關係，在喪失特定能力或動能後，能開展出什麼樣的可能性等問題。Kafer 的結論是，透過 Rich〈強迫異性戀和女同志的存在〉提供的思索方式，讓每個人重新看待親密關係、人際關係及政治的種種可能性，更重要的是，這些可能性不能被特定的身體標準及慾望所限制。

女性主義歷史的未來¹

張斐怡 摘譯

在女性主義歷史理論的討論中，Joan W. Scott 有其代表性。1986 及 1996 年他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對於女性主義歷史研究理論開展有重要的影響。一為在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的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文中提倡以 Gender 為歷史研究的新方法。² 十年後，

1 Joan W. Scott, “Feminism’s History,”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6:2 (2004), pp. 10-29.

2 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5 (December 1986).

她為 *Feminism and History* 一書撰寫前言時，又提出「差異」的觀點在女性主義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³ 2004 年，在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的“Feminism's History”一文中，她反省近二十年女性主義歷史研究的發展，並提出未來研究的動力及展望。以下為此篇論文的重點摘譯。

1974 年 Lois Banner 和 Mary Hartman 出版了一本名為 *Clio's Consciousness Raised* 的論文集，集合 1973 年在 Berkshire 婦女史會議發表的文章。⁴ 以希臘神話中掌管歷史的 Clio 女神為書名，闡示將以女性為主體進行歷史研究的企圖。對 Clio 的認同，顯現女性主義計劃的雙重面向：藉著將女性寫入歷史，以及取得女性歷史學家在歷史學中該有的位置，徹底地改變歷史學。

過去的幾十年，已經看到這兩個目標的成果，但成果並不夠完美。婦女史及婦女史學者在歷史學中仍未受到真正平等的對待，研究成果也多集中於歐洲及美洲的現代史。然而，由大量的出版品、相關科系的出現、學報的出版，以及得到大眾的支持，可知女性主義歷史學雖尚未取代舊歷史，但已不再被視為不合格的研究，且在歷史學界有了合法的立足之地。

由於幾十年來努力的成果是得失參半，使得女性主義歷史學家在展望未來時，出現矛盾及不確定感。1997 年，在 Scott 主編的 *differences* 推出的「在邊緣的婦女研究」專題、以及在 1999 年，*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所做的跨世代學者討論專題中，都看到前輩及年輕的婦女史學家坦誠地表達對婦女史研究未來的焦慮。⁵

女性主義歷史學者對未來感到焦慮的原因，可以從社會運動的角度觀察。前輩的女性主義歷史學家兼婦運參與者回首來時路，對往昔努力的價值

3 Joan W. Scott, "Introduction," in Scott, ed., *Feminism and Histo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6.

4 Lois Banner and Mary Hartman, *Clio's Consciousness Rais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Women, Sex and Class in Women's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5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9:3 (1997). Anne F. Scott, Sara Evans, Elizabeth Faue, and Susan Cahn, "Women's History in the New Millennium: A Conversation Across Three Generations,"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Part I 11:1 (Spring 1999), pp. 9-30; Part II, 11:2 (Summer 1999), pp. 199-220.

感到疑惑。因為，當前女性主義的發展，即使在學術上已經建制化，得到學術界的認同，但往昔的婦女運動精神已經喪失，取而代之的是個人學術研究的高度發展。在七〇及八〇年代，女性主義者參與政治運動，運動帶領著相關學術的發展。九〇年代以降，女性主義歷史學者卻撤退至象牙塔，與政治運動分道揚鑣。

其次，在婦女史成功地進入學術體制之後，卻失去原先在邊緣位置時的批判性。八〇年代，對於女性主義進入主流學術的問題，有許多討論。有人認為只要女性主義者現身在歷史系，就是對現狀的顛覆。有的則認為，女性主義婦女史如果不能徹底批判歷史領域的基本假設，進入主流歷史領域只會喪失其基進本質。這種應該採取改革或是革命路線的辯論，到了九〇年代，也不再熱門。在建制內的婦女史家比較關心的問題是：女性主義歷史的過度專業化、過度生產及片段化，導致婦女史學術界不容易找到一致性。

同時，美國的大學正遭逢結構性的改變，也使婦女史喪失其批判性。進入體制的女性主義學者，為保護已有的成果，必須與過去在學術上持相反意見的同事一起努力，以對抗視學術為商品的大學管理者。於是，女性主義者一反常態，變成對現狀的保衛者，而不是改變者。

因此，護衛女性主義歷史的現狀，似乎比期待未來有激烈改變更為重要。Scott 認為，女性主義歷史經過如下的歷程：(1) 理想與解放目標的實踐（必然是達不到理想），(2) 只好接受不斷追尋我們應該要達成的，(3) 強烈慾望的馴化。我們必須對女性主義歷史研究歷程有所瞭解，才能重新找回研究熱情，展望未來研究。

在婦女史進入體制之前，女性主義歷史學家的目標是書寫以女性為中心的歷史，以及由女性來書寫歷史。換言之，研究的主體是女性。婦女史研究逐漸茁壯後，研究者卻發現他們不能再以相同方式進行工作。一方面，主流歷史學研究中不再完全排斥女性，另一方面，由於女性之間的差異問題必須合理化，研究者開始以「性別」取代「婦女」做為研究的視角。這些現象使得許多女性主義歷史學家，誤以為當初吸引他們投入婦女史研究的熱情已經消失。

其實熱情並沒有喪失，只是研究者誤解了熱情的定義。早期的女性主義歷史學家將歷史做為爭取女性權利的批判工具。女性主義的主要精神並不在於將女性展現在歷史研究中，或是由女性撰寫歷史，而是在於其顛覆性的批判性。也就是說，研究者必須對當下流行的性別符號，以及歷史撰述的成規等進行批判。因此，女性主義必定是多變地、不受任何一種正統束縛的研究方法，不但利用對過去的批判顛覆現況，也開啓一個不同於以往的研究未來。批判是驅動女性主義前進的動力，這才是女性主義的熱情所在。

女性主義者的批判精神與其起源的背景有密切關係。女性主義起源於自由民主思想所宣稱的全民平等觀念 (universal equality)，包括公民權、經濟權和社會權。女性主義雖然源自於自由民主的思想，但是，女性主義批判自由民主的思想利用性別差異來組織權利關係，暴露自由民主制度內部的矛盾 (例如共和主義排除女性的公民權，政治經濟學用生理決定論合理化女性為低價值工人，應得較少薪資等)，並質疑其社會組織分類方式 (例如家庭、個人、工人、男性化、女性化、男人、女人) 的有效性。

以女性主義歷史與社會史的關係為例。人們常認為婦女史能被接受，是由於社會史的蓬勃發展。然而，婦女史的成功和社會史的興起並沒有必然的關係。相反地，女性主義是社會史研究必須思考的面向。又以勞工史為例，女性主義使勞工史家不能再忽略女性，並批判勞工史家複製工會的「男性氣概」。同時，女性主義歷史迫使勞工史家正視男女工作者的認同差異與受到不同對待，並反省「自然」總是被用來合理化男女工人的差別待遇和規範工資的理由。

以上二例可說明，婦女史正對歷史學的各個領域進行去熟悉化 (defamiliarized)，也就是推翻原有的研究視角，嘗試以新方法解釋歷史。在去熟悉化的過程當中，歷史研究產生更多與以往不同的問題意識。例如，以性別做為研究的視角，對任何一個歷史議題都有新的看法。但是，同時，酷兒、後現代、族群理論等等也挑戰女性主義發展的現象，說明婦女史本身也正在經歷去熟悉化的過程。

對有些女性主義歷史的研究者而言，對婦女史研究去熟悉化，是還不

能鞏固成果，就貿然地擴展新領域，因而感到不安。但 Scott 認為這個想法並不正確，女性主義歷史本來就應是不斷地創新，拒絕停頓於原地。雖然將女性的歷史經驗用女性主義方式呈現，是使婦女史躋身主流歷史學界的最有效方法，但女性主義歷史的重點不在於此。女性主義歷史學者對過往經驗的關懷，目的是為了顛覆現況、挑戰父權結構和許多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思考方式，並開創新的研究道路。

在七〇及八〇年代時，以女性認同為旗幟，批判社會的各個層面，女性主義者得到一些成果。然而這些成果在歷史學科中並沒有太大意義，並不能解決各類婦女之間存在的差異問題，也使婦女無法真正地認同為一體。因此，新一代的女性主義者為開創新的研究道路，必須改變其批判的角度。也就是說，性別不能做為女性主義歷史學者唯一有效地解釋歷史的方法，研究者的視野必須擴大，例如種族、性慾、族群和國籍等議題，皆有重要地位。

就以上所言，女性主義歷史的主要任務，不僅在於使女性成為研究的主題，更是用批判促使歷史研究呈現新視角。換句話說，女性主義歷史對於歷史學而言，要推動歷史學走向未曾思考過的領域。例如跨學科的研究便是一個女性主義研究的特徵之一。即使科際整合的理論與歷史學科有不相容的現象，使歷史學家感到憂心，並造成女性主義和歷史學間的緊張關係，但也使歷史學有新的發展。

總而言之，如果歷史學沒有問題，就沒有女性主義存在的空間。因此，只要歷史學的問題轉變，女性主義也將同時轉移其批判的主題。女性主義歷史是寄生於歷史學之中，而女性主義歷史學的未來，即跟隨歷史學的變化而轉動。